



山西文史资料 2/98

政协山西省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

山西文史资料

1998年第2期
(总第116期)

政协山西省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

封面设计：丁天顺
责任编辑：武胜利

山西文史资料 第 116 辑 1998 年 4 月出版

主办：山西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编辑：《山西文史资料》编辑部 印刷：山西省林业厅印刷厂
出版

地址：太原市东缉虎营 35 号 国内外发行：《山西文史资料》编辑部

电话：3045471—3115、3118 刊号：ISSN1004—5910

邮编：030074 CN14—1023/K 定价：6.00 元

山西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2A56/69

顾问 姚奠中 李蓼源
主任 赵政民

专职副主任 解宪卿

副主任 (以姓氏笔画为序)

丹保安 任国维 乔志强 赵望进

贾鸿鸣 聂嘉恩

委员 (以姓氏笔画为序)

丁天顺	马山明	尹世明	王艾权	王书福
田树苌	田斌文	卢润生	兰安乐	孙丽萍
戎晓峰	刘存善	刘胜章	刘大寿	刘忠伟
任铎夫	朱珠	杨小池	杨玉印	谷淑梅
沙万里	李泰	李小强	李可风	李茂盛
李桂琴	李夏林	宋富盛	宋发科	吴体刚
张平	张安塞	张志安	张爱国	张风山
张全盛	张国荣	张苏	陈正金	孟昭民
武胜利	周典	周志清	贺德宏	祝大同
郑智	郭行杰	高可	高春平	高凤鸣
耿析镭	徐亚东	陶正刚	阎金鲁	崔俊恒
谢泳	谢克昌	董耀章	董维民	

主编 赵政民

副主编 武胜利 王书福

编委 周志清

本辑责任编辑 武胜利

目 录

勿 忘 篇

侵华日军“太原工程队”概况.....	九 三(1)
太原工程队见闻录.....	肖 平(7)
我在太原日军集中营	李树德(28)
是党在日军太原工程队保护了我	张开明(51)
日军“教化队”中的八路军参谋任孝友同志	李烈人(56)
严惩汉奸	白巨保(60)
我在日军工程队	汤家汉(62)

烽 火 岁 月

潜入隰县进行军事侦察的回忆	刘 坚(64)
---------------------	---------

史 海 钩 沉

晋中解放区南下干部入湘记	宁书贤(82)
创办《新文艺》杂志的前前后后	杨田农 孙觉民(91)
山西民众争矿运动及晋矿归公运动.....	行定远(100)

人物述林

-
- 竺可桢先生与山西 郭汾阳(107)
忆赵修同志 许振(111)
忆祖父乔漪艇 乔木(124)
吸食鸦片败家的杜炳 陈正斌(128)
-

金融票号

- 阎锡山的太原德生厚银号始末 张正廷(132)
-

晋商觅踪

-
- 鲍店古镇药材会 张小根(134)
-

体坛名家

-
- 我在美国取得博士学位的经过 张咏(138)
-

医学史话

晋冀鲁豫边区太岳第四专区

- 中西医学研究会 郭济隆(146)
-

村志特载

-
- 汾阳西陈家庄乡土志(卷四) 刘天成(153)

侵华日军“太原工程队”概况

九 三

1937年11月8日，太原被日本侵略军攻陷，大约在1938年的前后，就有了“太原工程队”这个机构。

“太原工程队”座落在太原城的东北方向，距小东门较近，进小东门沿小东门街直向西，大约两三千米处，第一条路北向北拐的巷子的尽头就是“太原工程队”的原址。周围人迹稀少，几乎全是阎锡山时期留下来的空旷的场地。分析可能是阎锡山当时堆放物资的场所。正因人迹稀少，这一片地方，什么时候都是静悄悄地，静得可怕，一进入这片地方，就让人毛骨悚然不寒而栗。

“太原工程队”，这是一个堂而皇之的名称，从名称上你嗅不到一点血腥味。实质上，这是一座地地道道的人间地狱，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魔鬼窟。凡是在这座人间地狱生活过的人，都切身感到了帝国主义侵略者歇斯底里是什么味道。因此，被羁拘在这里的人，都习惯地称它为“死亡营”；也有人叫它为“集中营”，还有人从现象出发叫它为“俘虏收容所”。这不同的叫法，并不奇怪，这是人们根据自己切身的体验，给予它一个更切实际的名称。

“太原工程队”由日本侵略者“山西派遣军司令部”直接领导，它的任务是：收容山西境内的战俘，再把战俘根据不同的用途派遣出去。这是日本侵略者掠夺中国劳力的一个重要手段，正是出于这样的一个目的，因此，“工程队”收容的不仅是战俘，还有不少

的平民百姓。

“太原工程队”是一个戒备十分森严的地方，总面积约有数百亩之大。据说，老早以前，是阎锡山的一个炮兵营房，日军占据太原以后，就利用这个地方建了“太原工程队”。这么大的一个营房四周，原来就筑有三米多高的土围墙，“太原工程队”建立以后，把土围墙进行了加固，又把整个营房从南到北中间新筑起了一道连接旧围墙的围墙，把这个营房分割成东西两家。西面是囚禁战俘的地方，约占总面积的三分之一，东面约占三分之二，是日军看护部队的驻地。在囚禁战俘的地方除了四面围墙以外，在距围墙一米外的地带，沿着围墙有一道一米五高的高压电网，东围墙偏南是战俘所在区的出入口，在出入口处，有一个马鞍形的电网连接架，到了晚间就把连接架推向出入口处与电网连结在一起。紧挨出入口，在门口的北侧有一间看守室，经常有一个班的日军守护，在守护室内设置有电网监视器，电网上只要有动静，守护室就会发出电铃警报。在囚禁俘虏的西北角，紧靠电网处，还设有一个日军岗哨，这个岗哨，主要是监视西、北两个方向的。经常是两个日本兵守护。除此，距出入口不远的偏东北一点广场中有一个 10 多米的类似碉堡的建筑物，这个建筑物很神密，既不让让人去接近，也不允许人驻足观看，碉基下部只有一道门，经常用铁锁锁着。即便这样，人们还是了解到，就在这个类似碉堡的建筑物顶端，设置了许多重型武器，有轻、重机枪，有掷弹筒、手榴弹、燃烧弹、毒气弹之类。稍有点军事常识的人不用人介绍，就可以知道，这是一个人造的制高点，一旦俘虏营地有变，这个制高点就可以派上用场，就可以集中各种火力，控制俘虏营地的每个角落。有多少，就能杀伤多少。因此，不管是集体还个体，要企图逃出这个囚笼，几乎是不可能的。在俘虏营地外边，日军驻地的对面，还有一道门岗，人们通常称其为第一门岗，这是出入工程队的第一道门。这道门岗，通常只站一个日本兵。在日本人

看来，这可能不是一个要害的地方，因此，才不用多兵把守。

守卫“太原工程队”的日本兵，是受派遣军司令部直接领导，通常这里驻扎的守卫部队是一个连，大约有一百多人，领导这个部队的首长有人叫所长，也有人叫队长。在 1940 年到 1941 年，领导这支部队的头头叫松本，是个大佐军衔，下边还有个尉级队长，队部有翻译两人，其中一名是台湾人，原籍是福建省，名字叫陈财。这个人在李树德任战俘队长期间，为我地工人员所用，营救了我们不少的同志，做了不少的好事，应该说，是一个有民族气节的中国人。

日本人为了维持战俘营的内部秩序，由他们从战俘中指定一人，通常是在蒋阎军中任过团一级的军官，担任战俘中的队长，人们习惯地称他“苦力队长”，因为他本人并没有脱离俘虏身份。除此，也是从战俘中挑选一名军医，为战俘看病。战俘营内部这个队长，日本人还允许他从战俘中挑选三五人，成立一个卫兵班，负责维护战俘营内部秩序。另外，日本人也是从战俘中再挑选五六个人，叫“中系秩序员”，负责维持战俘营出入口处的秩序，任务是不让战俘接近电网。因为这个出入口，每天都要叫战俘出来几个人，打扫卫生。曾经有过几次，因为出来打扫卫生的这些战俘不知电网的厉害常有不注意，就接近电网，招致触电身亡的。

队长也好，内部卫兵也好，门口中系秩序员也好，都没有改变俘虏的身份。因此，人们取笑地说，这他妈的是“以华制华”。其实，正是有了这样的条件，才使我党的地下工作能够顺利地开展，因为这些人，都是地工人员李滋（李树德）一手挑选的。这些人全部是我八路军的战俘，其中有任过我军干部的，有经过考验革命意志未发生过动摇的共产党员。正是这一部分同志，成为我们地下工作的外围力量，他们都不同程度地配合我党地下工作，做了许多有利于我党我军的事。

战俘营的人数，由于流动性很大，经常是有来有走，所以很

难准确地说出共有多少人？据李树德同志讲，在他担任队长期间，最多时达到3000人，这个数字，看来还是比较可靠的。被俘人员进了战俘营，都按“天”、“地”、“人”等字进行编号，真实姓名名册，都留在了日军守卫部队的队部。因此，战俘间相互不识，相互不知姓名者甚多。

被俘人员的住房，除了紧靠北面围墙的西北角有一所砖瓦房，是供被俘人员中的将校官居住以外，一般的被俘士兵都住在大敞蓬房。大敞蓬房共有七幢，其中五幢是砖瓦房，是阎锡山驻兵用过的房子，其余两幢是中条山战役以后，俘员增多，临时搭建的大席棚。不管是原有的砖瓦大棚，还是临时搭建的草席大棚，都是坐北向南，排列整齐，东三西四，面积一样，每一幢大棚，差不多都要住到二三百人之多，晚上睡觉，个挨个，身擦身，人与人之间很难找到一线空隙，人们把这插依居住的情况形象地叫做“插萝卜”。

被俘人员的饭食，更是猪狗不如。一般吃的都是阎锡山留下来的包谷米，大多是发了霉的米。而且每人每日的供给量都不超过半斤（半斤是指十六两秤），一天两开饭。每逢开饭，被俘人员都要排成面对面的两行，饭先盛在一个个的火柴箱子内，由炊事人员拉着盛饭的箱子，从两行人的中间走，他边走你就赶快伸手去抓饭，有的把饭抓在了自带的茶缸内，有的没有茶缸，就把饭抓在了帽子里，也有的用衣襟去包，反正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怎的能抢上饭，怎的算。

由于恶劣的生活，俘虏中病死者，隔不了几天，就拉走一车（平板车），一车多时四五具，少时也有个两三具，有时不够两三具，为了凑够一车，经常也有把将死未死的病人抬在车上未死就葬。埋死俘的地方，就紧靠工程队的东围墙外边，直到东城墙根。这里是一片宽阔的荒草空地，草长得有一人高，拉去死人，用铁锹挖一个小坑，把身体一盖土就算掩埋好了。因为掩埋不深，因

此，经常有几条野狗，在这里啃吃死人；爱吃人肉的老鸦，也盘旋在空中时上时下，与野狗争食。只要有点中国人味的人，见到这种场面，都会义愤填膺，都会振臂高呼：打倒日本法西斯！

把在山西的被俘人员都集中到这里，这不是日本侵略军的目的。他们的目的是要把这些人（包括抓来的老百姓）除了死去的，除了老弱病残失去利用价值的，都要一个个派上用场，为他的侵略战争服务。

被俘人员集中就是为了派遣。日本人对被俘人员的派遣大体有以下几个去向：

第一位的就是到煤矿挖煤。因为煤是日本人掠夺的重要战略物资，因此，向煤矿方面派去的战俘数量最大。像山西的西山煤矿、大同煤矿、轩岗煤矿、富家滩煤矿，除此，还有东北的抚顺煤矿。在这些煤矿里，都有大量从“太原工程队”派遣去的战俘。

战俘在煤矿的劳动，都是无偿的。都是在日本人的严密监视下，在工头儿的鞭挞下，从事着一般人难以承受的重体力劳动，从事着两头不见太阳的劳动。劳动是如此，生活又怎样？一句话概言之，猪狗不如。吃不好，还吃不饱，加上枪逼、鞭打、少医、缺药，因此，派遣到煤矿的战俘，能活命出来的为数不多。

第二位的是特殊用途。这个数量不如下煤矿的人数多。但其残忍程度远远地超过了下煤矿。所谓特殊用途，主要有这样几个方面：

一是用战俘做活靶，对新兵进行“试胆训练”。据亲身参与了这种训练的日本人讲，1942年7月26日8时左右，从“太原工程队”拉出220余名战俘，在小东门外的赛马场让新兵练习刺杀，所有战俘，一个个都倒在了血泊中；又一次是在8月上旬又有120余名战俘，还是在赛马场，遭到了同样的命运。这只是说的太原这个地区，类似的法西斯行动，在全国何止一次、两次呢？

二是用战俘做化学武器、细菌武器的试验。这一点，了解

内情的日本人，战后都承认这是铁的事实。

第三是挑选一些身强力壮的战俘，送到派遣军司令部的医院，长期住到那儿，定期抽血，把战俘做为血库贮血的重要来源，抽死一批，再换一批，每次从工程队拉去的三十二十不等，从未间断过。除了抽血，有时根据需要，也是从战俘中弄去几个人，搞活人解剖，以此训练日军的医生。

第三位的是派到太原的几个工厂，如铁厂、电厂、火柴厂等厂，去充当苦力。能到这些地方去当苦力，也算是幸运，因为这些厂子大都在城外，这就为逃跑创造了条件。事实上我们许多战俘，都是从这些厂子逃掉的。

除此，也有大批战俘被遣送到日本本土去的。去了日本的，命运和遣送到本国的一样，也是有去无还，活着的几乎是零。

“太原工程队”也还有一点伪善的地方。比如战俘营给你派个医生，尽管有医无药，死人累累，总还是给你摆了个样子。再比如释放战俘按日本人的说法是：“我们讲人道”，“有定期的释放战俘制度”。实际情况怎样呢？重病不能行动者活埋；有传染病者才予释放。原因是保护他这一大批无价的劳动力，去从事他们需要的劳动，达到“以战养战”的目的。

本文所叙概况大体如此，但还须要说明一点，许多同志都写过“太原工程队”的人和事，我看一些有关这一方面的材料，其中涉及到“工程队”的情况，说法不完全一致，这并不奇怪，这是因为当时每个人的处境看问题的角度不同，因此，就不可能完全一致起来。就比如“太原工程队”这个名称，有的人住上好几个月，也还不知道这个地方叫个啥，因此，自己就叫它什么“集中营”、“收容所”，但说的都是一个地方。所以有必要在这里说明一下，以免读者对其真实性有所误解。

（本文作者“九三”是当年在“工程队”时的化名）

太原工程队见闻录

肖 平

我在晋绥八分区汾阳县游击队工作时，1941年在日军冬季大扫荡中被俘，经过汾阳南杨家庄据点、汾阳大营盘、城内俘虏收容所扣押，受尽日军残暴虐待、摧残、折磨后，于当年2月初，被送进太原市的“工程队”。

这一见闻录，是1941年2月至9月初，我在日军设的“工程队”——实际是俘虏集中营——期间的见闻。当时，我是日本侵略者的一名俘虏，失掉了自由，不可能了解它前前后后的建立到结局的情况，见到的只是8个月来自己经历的一般情形，仅仅是局部的、零星的、个别的、点滴的实情。这些实情，反映了日本侵略军部分的滔天罪行和中国军人不屈的斗争。如果能找到当年受难的更多的幸存者，将会得到更丰富的材料，以揭露日本侵略者在华虐待战俘的弥天大罪，看到我党我军顽强反抗日军的一个方面的景况。

就自己现时记忆所及，按当时的经历和耳闻目睹，写如下见闻。

一、集中营所在地

日本侵华期间，在太原市设俘虏集中营，诡称“太原市工程队”。

它的地址设在太原市小东门里路北不远的第一巷内，系城东

北角。集中营面积约有300亩，门口由日军站岗把守；进门的对面是日军约有四五十人的看守小队，及其军营、家属的一片住地；进门西行，是一片大约百亩的大操场，北边紧靠北城墙；南边是看管战俘的住地。这片住地隔为南北两处，北边是门卫队、医务、仓库及机关单位，和少校以上战俘、女战俘的住地；南边是大量男战俘的住地，其中设有队部、炊事房、小库房、大厕所等设施，大量的房屋是关押战俘的，地面约有百亩，向东设有门卫队站岗把守。集中营围墙上都有铁丝网。

二、战俘的住宿

在关押战俘的这片大院内，有日军从战俘中选出二三十人作为门卫队站岗，发给服装，形似伪军，持有上刺刀的步枪，身携子弹袋，但没子弹。他们没有出入集中营的自由，生活、吃饭在靠北大院内，比战俘要好些。

进这大院门内靠南有一口大井，紧靠门卫，他们可以监守，以防水井出现不测。大院西南角从东至西是一排平房，设地铺关押战俘。大院中间，从东至西是一个几十米长的大庭，看来，以前可能是座大仓库。这座大庭西端一小部分，中间以通道隔开，以便通往北边的院部、炊事房、厕所、储藏室大院。隔开的南边小部分房称为“病房”，实际上是个待死房；通道北的大房是关押战俘的主要地方，最多要关押800多人。这座房朝南有两个大门，内设四个大通铺床，床约二尺高，三米宽，北边一个床长度约几十米，人多时，要住400多人；南边被门隔开的三个大床，每床约住百余；南北床铺之间，有一条约二米宽的走道；睡觉是足对足交叉睡，像群羊相互依偎，拥挤在一起，翻身都很困难。至于大西南角小平房住的战俘，房低、屋小、潮湿，臭气熏天，更不像人住的地方。

战俘初去，只发给破旧的脏棉毯一条，铺盖都是它，寒冷时，是身披的御寒物。白天，不出外做工，只能坐在床上，不准说话，

只能咬耳低语。

大院门内的水井，设有一些水槽，这是战俘唯一洗手脸的地方，别无其它卫生设施，因此，大多数人是蓬头垢面、衣服褴褛、污脏，不堪入目。

三、给战俘吃些什么

黑面、沤玉米、小米，是战俘的主食。1941年初，当时战俘近千人，人数比较少些。一天两顿饭，上午是小米玉米粥，一人一碗，给一点烂咸菜，下午一个三两多重的馍馍，给半碗盐水菜汤，看不见油水，以此维持生命不死。随着战俘人员的增多，馍馍越来越小，粥越来越稀，水菜越来越少，饥饿惨象就日益严重。据说，发给集中营的粮油，本来就不多，但有些油水，一些较细的菜，被管理人员、队部办事员、卫兵、门卫队及炊事员等开小灶一吃，轮到大量战俘那就更差得多了。

曾目睹到两起惨剧：

1、有一战俘，年仅20岁，姓名不详，因饥饿难忍，精神有点失常，竟吞食厕所大便，使人气愤至极。

2、大院大门附近水井、门卫虽能监管，但不断有人去跳井自杀。我曾看到一个战俘跳进去，打捞上来，人已死，而水井未见淘洗，照样使用。

四、对战俘的管理

除集中营大门内驻守的日军外，在广场以西的南北两大院内，包括日军指定的“工程队”队长、门卫队、卫兵（带袖章在大院内维持秩序）、队部所有办事人员、医护人员、炊事员等，都是经日本人和翻译选出指定的。以俘虏管理俘虏，这可能也是“以华制华”的翻版，不用花任何钱。这些人与一般俘虏不同的就是偏吃，在院内生活比较自由。他们不能自由出大门上街，一样是俘虏；据说表现好、时间长的，可以释放，给找个事干。“工程队”队长可以接触集中营日军军官，和翻译官来往；门卫队员有时在

日军跟随下可以上街走一走。

可以看到的情况：

1、翻译是日常在战俘院活动的主要人员。他除在队部休息、吃喝、同队部人员扯谈外，就是在大院内和战俘营宿舍巡视。他看见谁不顺眼，就随便训骂，有毒打和虐杀的权力。“工程队长”也有这个权利。这种杀人权，和明目张胆的杀戮不同，而是毒打致残，送到“病房”，实际是让待死。所谓卫兵，职责是在大院内巡视，观察战俘的行为动静，充当翻译、队长的打手，以此维持秩序。

2、维持秩序的办法

所有俘虏，身上带着像牲口一样编的数字符号，没有姓名。1941年前有天字号、地字号；1941年上半年有人字号，每号以一至千计。以后有才字号，春、夏、秋、冬号。不编队组，叫人只叫号。床位也不依号排列，所有战俘乱堆集在一起。看来这种办法是为了防止战俘有组织联络和便于交往。

维持秩序的主要方法就是毒打。翻译、队长、卫兵，只要看见哪个战俘不按要求活动、说话，先是吼叫、指出，认为不顺眼，就用棍棒没头没脑地毒打；看见战俘口角或打架，不问任何理由，就将双方打个半死，伤轻可回原床位，伤重就送进病号房。因此，一般人都不敢互相发生打架冲突。

在日常秩序方面，有日军和门卫队（形似伪军，有枪无弹）各4人，肩背荷上刺刀的枪，每隔两小时到住宿地雄纠纠气昂昂地纵队行进，示威式巡视，转走一趟。这时大庭中不准人走动，静悄悄地。如看见不顺意的地方，就向队长翻译说知，要求严格纠正。纠正办法是找出当事人毒打一顿。

日军使用残酷暴力，给战俘非人待遇，以管理牲口的办法，使战俘成为奴隶。

我曾受过一次棒打。战俘整日在床上静坐，不许说话，几百

人在一起，空气污浊，那滋味是很难受的，有机会就愿到大院里走一走，这机会大多是上厕所或扫大院时才有。一次，我和二十人到院内放风，遇到工程队长提木棒出来，他看院内这么多人，认为秩序不好（日军不允许随便散步、转游），提棒见人乱打，往大庭内驱赶，就象赶牲口、驱羊群一样。被赶的人，仓皇奔跑，许多人挨到了棒打。我在奔跑的人群中，脊背上也挨了一棒。当时心里很气愤，难友向我表示安慰，自己无可奈何。

五、病房的惨象与万人坑

日军在集中营设病房，纯粹是为它的罪行涂脂抹粉，表示它还有点人道主义，实际上“病房”就是待死房，为它制造“万人坑”准备死尸。

俘虏大量患病，是日军对战俘食不果腹、肮脏的饭食、恶劣的住宿、恐怖的环境和毒打虐待造成的。所谓对病号医疗，是做做样子而已。他们仅仅给病人几片药，或给伤者涂点红药水、碘酒，谈不上诊断治疗。战俘视病房为人间地狱，闻之色变。只要被送入病房，必死无疑，不要想活着出来。

病号经常有一二百人。这些病人，一部分是日军和门卫队巡视住宿地，发现有卧床不起的病人，说是怕传染，要隔离开，强迫送进去的。另一部分是毒打致伤，行动起居不便被送进去的。日常被带往治病的人很少，就怕说病重被送进病房。我看见过个特殊的例子。有个投降日军的人，他想享受优待，常在巡视日军或卫兵面前献殷勤，谈其他人的坏话，使得别人挨骂、挨打。这人叫刘化南，和他在同一部队的被俘战士，在日军大批荡中，因被他欺骗过，叫他们一块离开休养所回家，实际是引他们投降日军，因而非常恨他。他病了，那些战士就检举他病重，他被送入病房，不久就死了。

我被送进集中营，曾患感冒，实难支撑，日军巡视大庭时，我认识的战士，非常关心爱护我，将我扶起坐在他们中间进行掩护，